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97千;

1979年8月第一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统一书号: 11089·23 每册: 0.78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在一九六〇年根据敬爱的周总理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号召老年人“从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它的老根子和供研究历史的参考”的教导编写出版的。从开始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自治区各级政协，做了大量工作，也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文史资料。共编选了《内蒙古文史资料》蒙文的四辑、汉文的五辑（内部发行）和公开发行《辛亥革命史料》一辑。多数材料受到研究蒙、汉民族现代史者、关心史料的单位和关心现代史的人们所欢迎。只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致使已征集到的资料散失不少，因而此项工作不能不停顿下来。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史资料工作又能健康的进行了。

现出版的这一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辑）就是前五辑的续辑。我们自治区是以蒙族为主体，包括汉、回、满等多民族的地区，经历清末至国民党反动统治，还出现过伪蒙疆政府这个历史怪胎的统治。在这多民族的地区，经历错综复杂，历史变化剧烈，自然具有极为丰富的重要历史资料。因此，期望有丰富阅历者特别是老年人，积极响应中央重新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号召，踊跃撰述。关于革命史料的搜集、整理、编写工作，我们也将积极准备进行。

这一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辑）是在内蒙古政协恢复

工作期间，从现存资料中，根据一九六五年周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对文史资料工作“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指示精神，编选而成的。在编选中难免会有缺点错误，请领导和读者及时给予指正。

编者

一九七八·十一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印行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本自治区的史料，并推动征集和撰写工作的开展。在继续编选时，尽力本着周总理生前指示：“文史资料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要使资料成为研究历史的素材”，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或近于消遣”的精神。选刊的稿件大部分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撰写者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叙述的，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内容可能不够详细全面，观点也可能会有某些片面性，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

二、本选集所选的资料，主要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民族、宗教、工商、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实。撰写时可以不拘体裁，不求完整，使用蒙汉文字为主，必要时，也可使用其他文字，只要真实具体，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的，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以选录、删节或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对来稿的原意则保留不动。

目 录

日寇怎样统治伪蒙·····	李守信 (1)
吴鹤龄和“蒙古各盟旗	
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的活动·····	张绍庭 (23)
我是怎样从“马贼”当上汉奸的·····	李守信 (35)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 (67)
王英一生的罪恶活动 ·····	韩祥符 (102)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	德穆楚克栋鲁普 (143)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	德穆楚克栋鲁普 (195)
所谓“凌陞通苏”事件的真相 ·····	正珠尔札布 (230)
尼冠洲之死 ·····	哈斯瓦齐尔 (236)
百灵庙抗日战役前后 ·····	靳书科 (244)
抗战时傅作义部队从绥远撤退及在太原	
的溃败 ·····	韩伯琴 (269)

日寇怎样统治伪蒙

李守信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蒙，完全是采取了他们奴役榨压朝鲜、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并抄袭了中国历代王朝、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派笼络怀柔边疆少数民族所使用过的手段，随着国际局势和侵华战局的变化，针对伪蒙内部的各种矛盾，运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把蒙奸和汉奸全玩弄在掌心，使蒙、汉人民不敢起来反抗。伪蒙政权这个历史怪胎，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正式诞生，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随着日本投降在张家口土崩瓦解，一共存在了九年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经过两度改组，头绪相当纷乱，特别是由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草原迁移进城市以后，内幕更为错综复杂。为了提供近代史研究者理解伪蒙历史，还是首先介绍日寇怎样统治伪蒙。兹就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的经历见闻，举出事例说明此种真实情况。

(一)

“九一八事变”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姨父补英达赖的策划下，公开跑到南京，补则密赴大连，和蒋介石

石与日本“关东军”同时进行政治勾搭。在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情况下，把身价提高了。加之西藏的班禅喇嘛，在这前后替他由东向西联络内蒙各盟旗的王公，他便有了统一内蒙，想当“蒙古皇帝”的野心。一九三六年，他跟蒋介石表面决裂，在嘉卜寺（今化德县）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时，即以成吉思汗诞生的那年做为纪念。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德王的伪政府和我的伪军，由察北进犯绥东，所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默许帮助他建立一个相同于伪满那样的国家。德王和溥仪不同，他不敢搬用君主立宪的帝制形式，而是让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充伪政府的正副主席，他任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

日寇公开立满洲国，对于蒙古是“分而治之”，绝不许德王把蒙古统一起来。“九一八事变”初期，他们为了利用东蒙，曾组织过伪“蒙古自治军”，但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成立以后，即把东四省境内的盟旗划入伪满，以兴安岭这个山脉命名而不以民族命名，分成伪“兴安”东西南北四个省，“蒙古自治军”也改称为伪满的“兴安军”。德王因此在我进驻多伦时，他跑到伪“兴安”西省，和伪“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扎赉特旗王爷）等好多人，瞒过日本“关东军”举行过一次民族团结的“歃血同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跟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的军队，在商都和张北作战期间，由于嘉卜寺被袭，德王没敢到察北前线而逃往多伦，巴特玛拉布坦为了践盟，从伪满前来多伦，对他加以保护，东条英机的军队攻陷张家口，他才被陶克陶坐上飞机找回，到张北重新跟我合在一起。

张家口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沦陷，大同于九月中旬、归绥和包头于十月十四日及十六日相继沦陷，从此日寇将平绥路西段打通。德王和我率领伪“蒙古军”等一枪未放，跟在日本军队的后边，由察北进入归绥和包头。长城内外至外蒙边境这一地带，既是日本人打出来的天下，当然日本要进行统治，决不肯叫外人去做主子。所以在伪“蒙古军”由察北向西出动期间，日本占领军和特务机关并没有和德王商量，就把宣化、大同两地区，于九月四日扶植张家口的商务会会长于品卿为主席，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十月十五日又扶植大同的前清拔贡夏恭为主席，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到了十月二十七日，才将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乌兰察布盟大部与土默特旗这个范围，在归绥给德王成立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标榜内蒙古自治是名，而图谋内蒙古独立是实。但日寇却把伪蒙视为和“察南”、“晋北”以及汉奸殷汝耕的“冀东”相同的政权，由梦想的国家降为特殊地区，使他大失所望，其他的蒙奸也大感不快。

伪蒙在“军政府”时代，受“关东军”操纵；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在张家口一地就出现了三个上级衙门。先是日本的张家口特务机关和“驻蒙军”军部；接着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而组织起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外在张家口日本侨民居留地，还有一个受东京直接“嘱托”、现役少将级军官为首脑的管理及监督伪蒙政权的机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日本虽然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随着

取消，但具体统治它们的是日本“驻蒙军”军部和特务机关。这种状况一直到日本投降没有变动，只是名称上改换了几次。特务机关先改称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以后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始终挂着牌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前，它就管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移到张家口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留在归绥，从小仓特务机关长开始，便兼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最高顾问，当然兼管设立在归绥的“巴彦塔拉盟”盟公署。

伪蒙在“军政府”时期，伪正、副主席和总裁之下，只有军事、民政、财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有了政务院和参议府。在政务院总裁之下，设立了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并将伪政府所在地的归绥，按蒙古语音改称“厚和浩特”，且定为“首府”。这就是德王硬要把他的伪政权铺排成一个国家的样子。“联合自治政府”迁到张家口之后，在纪年和“首府”之外，又挂出了“黄（代表汉族）、蓝（代表蒙族）、白（代表回族）、赤（代表日本大和民族）”的四色“国旗”；同时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添了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署。政务院底下除了原先的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又增加了民政、司法和交通三部，以及牧业总局、権运清查总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附属机关，并且把“察南”和“晋北”两个伪府，改组为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个政厅；一九四三年，将这两个“政厅”改为“宣化省”与“大同省”。于是伪蒙政权最后形成了一个辖有五盟两省四市和面积五十万平方公里与人口五百五十万的“国家”局面。

日寇虽然允许德王如上述那样折腾，但是对于伪蒙并不按国家来看待，除了把伪蒙简称为“蒙疆”，在伪府政务院之下却不许设立外交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后来改称为公使馆，而没有改称为大使馆；伪蒙驻东京、长春和北平的执行外交联络的人员，也称为驻日代表部代表，驻满代表部代表和驻平办事处处长。德王两次访日时，日本天皇裕仁并没把他看成一个国家的元首，像对溥仪那样接待。德王访满的时候，溥仪也未亲往郊迎，只是赐以便宴，而未举行国宴。最给蒙古民族丢人的，是德王见了溥仪，还行了三跪九叩首的跪拜礼。我因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设在归绥，到张家口是暂来暂往，不知汪逆精卫访问德王，和褚民谊与苏体仁代表伪南京“国民政府”与伪北平政权访问伪蒙时，德王如何欢迎招待，但伪满驻伪蒙的代表李宜顺，和伪蒙驻日代表部代表特克希布彦（王宗洛），在张家口官场的宴会上，都被恭称是“大使”，这不过是为了听来舒服，叫着过瘾罢了。

从日寇不承认伪蒙是国家来观察，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协助蒙古民族复兴”，完全是骗人的谎话，而假借蒙古的旗号，做他们的政治招牌，利用蒙古败类，当作他们侵略的工具，而搜刮蒙古人民的物资，充实他们战争的资源，才是日寇的真正目的。德王起初对此还不甘屈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家口成立起“蒙疆联合委员会”，日寇曾叫他担任这个机构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委员长，他坚不就职，以示抗拒。推诿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答应担任了这个傀儡。头一次访问日本是在“联盟自治政府”时代，他以为伪蒙不能建国，是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驻蒙军”军部捣的鬼，

不是日本政府的本意，他主要是为告“御状”而到东京。不料“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警告给德王担任翻译的伪府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即德古来）不准对新闻记者说出“建国”两个字眼，否则要砍吉尔嘎朗的脑袋。德王见了天皇裕仁和陆相坂垣征四郎，提到“建国”问题，都叫他回去和驻蒙的联络部与军部研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很扫兴地从东京回到归绥。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组为“联合自治政府”时，先是德王叫东蒙的几个知识分子舞文弄墨，反对“蒙疆”的“疆”字。援古证今，想把伪蒙变成日本体系里的一个邦，在“邦”字上大做文章。但均没有得到东京的批准。以后他便赖在归绥不走，不去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的新印。日本“驻蒙军”曾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两次从张家口前来劝驾，并命令我在归绥就近“逼宫”。我虽没有逼他，但“驻蒙军”给他来了一个申斥性电报，表示他如果不去就职，便要另选旁人，他还是乖乖地到了张家口。

尽管德王以元首自居，吴鹤龄也摆着国务总理的架子，在一九四〇年汪精卫“还都”以前，日寇为了敷衍汪逆，指定华北的王克敏、华中的梁鸿志和“蒙疆”德王，出席坂垣操纵下的“青岛会议”，显出日本人要把伪蒙变成汪精卫领导下的“蒙政会”，德王恐怕降低身份，叫我以伪蒙疆政府副主席的资格前去出席。最可笑的是一九四三年初，日寇在进兵广西以前，唯恐华北的伪军在后方捣乱，冈村宁次（日寇侵华指挥官）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把我和汗奸庞炳勋、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等伪军头脑，都召集在北平软禁了半个多月。在接到“驻蒙军”转来冈村的通知时，德王还曾

去电问明允许我坐首席以后，才叫我前去参加。但汪精卫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时，德王受日寇指使，不得不派伪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卓世海)和伪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当该会委员，他和我及吴鹤龄的名字，虽然没有和汗奸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梁鸿志等并列在一起，可是伪蒙疆政府和伪北平政权与伪维新政府，都被人们视为汪伪国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伪蒙是日本的孙子辈，没有取得和伪满、汪伪政府同等地位，顶高是等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那样的傀儡政权。

(二)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松井为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伪府的政务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和军事最高顾问高场损藏，均受松井直接指挥。其时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为酒井隆中将，而领导“联盟”、“察南”和“晋北”三个伪政权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又是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同时在我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部里边，还有一个次于最高顾问高场的，并且很跋扈的盘井顾问。因为这几个主要统治伪蒙的日本人名字里边，都有一个“井”字，加之自从进城以后，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不禁使伪蒙群魔产生了“我们吊在井里”的感慨。

在察北的时候，由于他们一方面想利用我们，一方面又怕我们不可靠，所以表面上对我们相当客气，并且处处迎合迁就；可是到了归绥以后，本来是日本出兵打下的地方，而我们去坐享其成，众人自知礼屈，不由得低声下气起来。另

外，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军进攻之下，都是节节败退，到了一九三八年春，连上海和南京也相继放弃，多数人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日本人虽然嘴上没说，但是眉目间却表现出“你们占了便宜，还不感恩图报”以及“你们想跑就跑吧，看你们往那里跑”的那种神气，于是大小顾问都板起主人的面孔，他们咄咄逼人的气焰，使伪蒙群魔初次尝到当蒙奸和汉奸的苦头。

“我们掉在井里”的悲叹，和一九四二年我跟德王访问伪满时，听到那里的几个大臣对我发出的“我们被装在坛子里边”的哀鸣一样，都足以说明日寇对蒙奸和汉奸特别压制，并且跟“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的人隔离，所以如同掉在井里和装在坛子里边一样，不知抗战的真实情况。关于压制方面，日寇统治伪蒙主要是由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发号施令，“驻蒙军”相当于伪满的“关东军”。当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以后，就在张家口成立。它不仅指挥“蒙疆”境内的日军和伪军，还有操纵“蒙古军政府”的政治参谋，对“蒙疆”的三个伪政府实行军事管制。从张家口沦陷到张家口解放，“驻蒙军”司令官更换了莲沼、冈都、柑柏、崎田、神协和根本博等好几个人，但其政治参谋很少调动，先是竹下义晴少将，以后一直是大椿熊雄大佐。竹下虽然脱离了“驻蒙军”军部，但晋级为中将，继酒井隆之后，升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大椿熊雄，都是日本的“中国通”（竹下曾任过“关东军”的参谋和山海关与上海的特务机关长；大椿熊雄未来伪蒙以前，在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工作多年）。这两人对蒙奸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和“察南政厅”的汉奸们说：“蒙古已被汉人同

化的快亡了”，并说：“蒙古人的反心很大，不如你们和晋北亲日”。所以“驻蒙军”军部，老是打发他们向德王施加压力。

日寇的“驻蒙军”军部，是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的顶头上司，经费和师长以上的人事，全由“驻蒙军”军部关发和决定。“蒙古军”每年的经费预算，听说为八百万“蒙疆银行”钞票，伪蒙政府按“国防开支”解交给“驻蒙军”军部，军部转发给我的顾问部掌握。除了每月给我发两千元薪俸（内中扣去津贴最高顾问四百元和参谋长四百元，我实落一千二百元），每年给我两万元“机密费”外，我只是专刻了一个图章，交给日本人随便盖用，其他情形我从不过问。我的军需处长崔景岚，也仅知管发总司令部人员和各师的数字，此外他更不敢打听。所以归绥的许多“株式会社”和“料理店”（卖小吃喝的商店）里的日本人，也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拿钱，顾问们请客宴会的酒资和其他费用如嫖妓的“床头金”，亦由伪蒙政府压榨蒙汉人民的血汗来开销。我的官兵过着稍高于国民党部队的生活。至于重要人事更动，在没有发表以前，军部还叫我的最高顾问徵询我的意见，这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非到剪除我的羽翼时，我老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服从。

由于日寇对伪蒙统治非常严密，无关“蒙古军”的事，我因避嫌疑而忌讳打听，所以不知道“驻蒙军”军部和“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究竟是谁隶属于谁。兴亚院的联络长官，最早是酒井隆中将，以后是竹下义晴中将，最后是岩崎氏男少将。酒井隆初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改组为兴亚院联络部后，即任联络长官。到了岩崎氏男任长官时，

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所以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都是特务机关的化身，能指挥动历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这个机关不仅管理伪蒙的军政事务，也进行有关甘宁青新回民的特务工作。设立在包头的、由蒋辉若领导的“西北保商督办公署”，就是听命于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的一个特务组织。我因薪俸不够应付伪蒙的政治环境，到达归绥以后，又象我在热河赤峰和开鲁驻防时一样，利用职权贩运起大烟土和私货，是经王英的表弟郭胜三介绍，认识了北平“中央金店”的经理高雅杰给我搞的。此人由包制军衣发家致富，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系统的将领都有联络，曾给宋哲元在北平办过小型兵工厂，与马鸿逵交处莫逆，马称他为“高二皇上”，以后和马汉三（军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也搭上关系，成了军统特务。抗战初期，高在全国各地共有十一处买卖，西安、银川和甘肃的玉门均有分号和支店。他因周转不灵，曾向酒井隆借钱，酒井隆给金井章二下了一个条子，从“蒙疆银行”贷给他四十万元巨款，做为让他跟马鸿逵“拉线”的交换条件。

张家口的特务机关由兴亚院联络部改为公使馆，归绥的特务机关始终没有取消。在“七七事变”前，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为羽山喜郎，日本占领以后的第一任特务机关长是松井，第二任是桑原，第三任是小仓；“蒙古军”的最高顾问，到了归绥以后，第一任是高场，第二任是三毛一，第三任便由小仓兼任。小仓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便成了归绥的最高统治者，他在这一期间，还把白凤翔的“热河先遣军”收编为“东亚同盟军”。因为德王不买他

的账，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坂垣送了我两匹洋马，应许给德王发五百枝日造“三八式”步枪，装备德王的卫队，枪枝由东京发到归绥，他霸住不给，到底也没把德王的卫队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一直是使用着我在多伦时给凑的旧枪。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把日、蒙、汉籍特务，分布在各个角落收集情报，并根据特务们调查了解到的线索，派直属的“日本宪兵队”扣捕抗日反蒙的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就是被归绥特务机关破获。“蒙古军”总司令部也有一个由三五十人组成的“蒙古军宪兵队”。这个宪兵队不是我的特务组织，而是“日本宪兵队”的帮凶。日本宪兵班长，可以指挥“蒙古军”的中校宪兵队长。我在归绥驻防时，由师长陈景春以子弹向天主堂的中国神甫白祥换到一部法国短波无线电收音机，可以收听重庆“中央社”，延安“新华社”和莫斯科放送的华语广播，以及哈尔滨的地下电台“劳动人民声音”。结果被归绥特务机关知道，日本宪兵还不好意思到我杨家巷的家中查看，却指示蒙古宪兵，于黑夜间闯进我的卧室，我大发雷霆，把他们骂走。“蒙古军”的宪兵队长席子纯，为此好几个月躲着不敢见我。后来他托人向我央告，说是日本宪兵队叫他派人执行这一任务，只好惹得我生气。

我在伪蒙时期，实际处在日本特务的监视网里。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假装朝鲜人的日本人，他和我的翻译郝贵堂与贴身伺候我的勤务兵唐成良，都是特务机关介绍来的。唐成良是热河隆化县的一个乡下孩子，伺候过松室孝良，跟松室把日本话学会，由小仓派到我跟前当差。后来郝贵堂和唐成良都被我收买为亲信。小仓为了能进一步探听到我内宅的